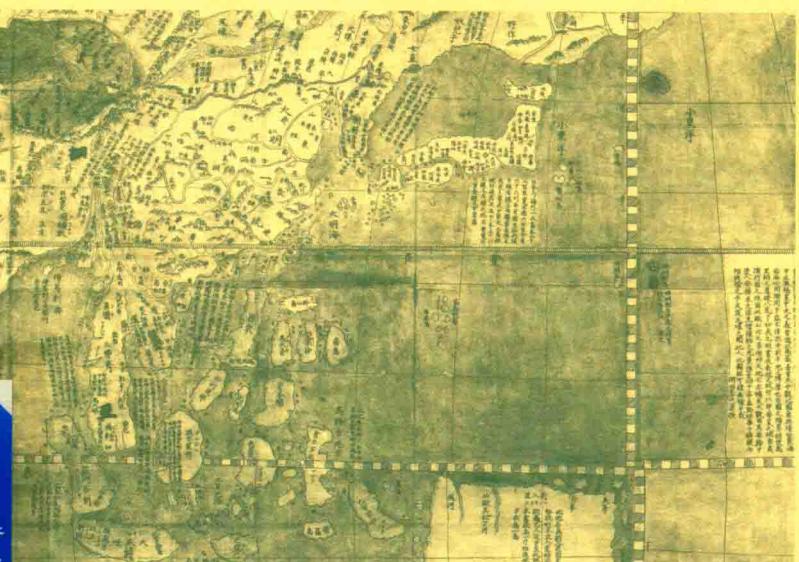


◎ 孙江 主编

亚洲极史研究

第3卷



◎ 本卷主编
张凤阳 孙江

亚洲概念史研究

第3卷



 商務印書館
创于 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洲概念史研究·第3卷 / 孙江主编.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2018

ISBN 978-7-100-15963-0

I . ①亚… II . ①孙… III . ①亚洲—历史—研究—丛刊 IV . ① K300.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7567 号

南京大学双一流经费和人文基金资助项目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亚洲概念史研究

第3卷

孙江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963-0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17 1/2

定价：78.00 元

《亚洲概念史研究》

主办 方：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字母为序）

- 阿梅龙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
陈力卫 日本成城大学经济学部
陈蕴茜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方维规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冯 凯 德国汉堡大学汉学系
韩东育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胡传胜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学海》编辑部
黄东兰 日本爱知县立大学外国语学部
黄克武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黄兴涛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李 帆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李恭忠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李炯丘 韩国翰林大学科学院
李里峰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
梁一模 韩国首尔大学自由研究学院
林少阳 日本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
刘建辉 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闾小波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潘光哲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彭南生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沈国威 日本关西大学外国语学部

石 斌 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史易文 瑞典隆德大学中文系
孙 江 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
王宏志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
王马克 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
王晴佳 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
王月清 南京大学哲学系
王中忱 清华大学中文系
杨念群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张凤阳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章 清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朱庆葆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编辑委员会

主 编：孙 江
编 辑：王 楠 于京东 石坤森
助理编辑：徐天娜 闵心蕙 王瀚浩 宋逸炜

开卷语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历经“语言学的转变”之后，由不同学科条分缕析而建构的既有的现代知识体系受到质疑，当代人文社会科学正处在重要的转型期。与此同时，一项名为“概念史”的研究领域异军突起，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概念史是反求诸己、推陈出新的必经之路。

“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Conceptual History)一语最早见诸黑格尔《历史哲学》，是指一种基于普遍观念来撰述历史的方式。20世纪中叶以后，概念史逐渐发展为一门关涉语言、思想和历史的新学问。从概念史的角度来看，概念由词语表出，但比词语含有更广泛的意义；一定的社会、政治经验和意义积淀于特定的词语并被表征出来后，该词语便成为概念。概念史关注文本的语言和结构，通过对历史上主导概念的研究来揭示该时代的特征。

十年前，本刊部分同仁即已涉足概念史研究，试图从东西方比较的角度，考察西方概念如何被翻译为汉字概念，以及汉字圈内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概念的互动关系，由此揭示东亚圈内现代性的异同。当初的设想是，从“影响20世纪东亚历史的100个关键概念”入手，梳理概念的生成历史以及由此建构的知识体系，为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石。但是，阴差阳错，力小而任重，此一计划竟迟迟难以付诸实行。

十年后，缘起石城，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先后于2010年和2011年主办两次“东亚现代知识体系构建”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各国的学者围绕概念史的核心问题展开了热烈辩论。本刊编委急切地认识到，要想推进概念史研究，必须进行跨文化、跨学科的努力。

本刊是通向概念史研究的一条小径，举凡讨论语言、翻译、概念、文本、分科、制度

以及现代性的论文及评论，皆在刊登之列。通过出版本刊，我们希望达到如下目标：首先梳理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生成与流变，继而在东亚范围内进行比较研究，最后在全球史（Global History）视野下，从中国和东亚的视角与欧美学界进行理论对话。

本刊将本着追求学术、献身学术的宗旨，为推动撰写“影响 20 世纪中国及东亚历史的 100 个关键概念”做知识和人力准备，诚恳欢迎学界内外的朋友给予关心和支持。我们不敢自诩所刊之文篇篇珠玑，但脚踏实地、力戒虚言，将是本刊一以贯之的态度。

Verba volant, scripta manent(言语飞逝，文字恒留)。

《亚洲概念史研究》编委会

目录

序：重审中国“近代” 孙 江(1)

文本比较

一部缺失“开化”的“开化史”

——田口卯吉《支那开化小史》与日本文明史学之困境.....	黄东兰(9)
一、引言	(9)
二、田口卯吉及其“开化史”思想	(12)
三、两部“开化史”的历史叙述	(17)
四、“开化史”视野中的中日之“开化”	(19)
五、告别“开化史”	(27)
六、结语	(32)

西周与严复——以学问观、道德观为中心 高柳信夫(34)

一、引言	(34)
二、西“学”的划时代性	(36)
三、“诸学体系”的问题——西周	(38)
四、“诸学体系”的问题——严复	(41)
五、“理”的相关问题	(44)
六、结语	(49)

严复的“格致”：从培根到斯宾塞——以《天演论》前后为中心 沈国威(51)

一、小引	(51)
二、《天演论》中的“格致”	(52)
三、西学三篇中的“格致”	(61)
四、译作与著述的互动	(70)
五、代小结：西学格致的门径与功用	(73)
附录	(78)

概念考古

从“启蒙”到“启蒙运动”：近代中国“Enlightenment”的概念史	陈建守(83)
一、前言	(83)
二、翻译“Enlightenment”：启蒙十运动=启蒙运动	(86)
三、“Enlightenment”=“启蒙运动”降生中土	(114)
四、以“启蒙”的名义：作为基本概念的“Enlightenment”	(121)
五、历史的书写与实践：以教科书的“Enlightenment”论述为中心	(130)
六、结语	(155)
民族概念及其对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影响.....	王马克(160)
一、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 and nationalism)	(160)
二、中国概念史中的鞍型期	(164)
三、中华帝国晚期新术语中的民族概念	(167)
四、清朝晚期族群化的(ethnicized)民族	(170)
五、排满运动中种族化的(racialized)民族	(175)
六、民国时期包容性的民族概念	(180)
附录	(190)

耶稣会时代

有关利玛窦南昌活动的一段历史记忆

——朱国桢《涌幢小品·浮提异人》研究	宋黎明(195)
一、浮提国“飞仙”	(195)
二、黄白术传奇	(197)
三、三棱镜与《圣经》	(200)
四、《浮提异人》的来龙去脉	(202)
《天学传概》同名异文考论	谭树林(206)

一、黄鸣乔、李祖白《天学传概》撰著之成因	(207)
二、黄鸣乔、李祖白《天学传概》之內容	(212)
三、黄鸣乔、李祖白《天学传概》之影响	(215)

概念史的谱系

概念史：德国的传统	冯 凯(221)
一、布鲁内尔、孔兹与《概念史档案》(Archiv fur Begriffsge-schichte)	
.....	(221)
二、罗特哈克尔、里特尔和哲学上的“概念史”	(224)
三、莱因哈特·科塞雷克与《历史的基本概念》(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	(225)
四、朝向历史语义学：卢曼、雷查德和欧洲概念史计划	(231)
五、迈向欧洲概念史	(235)
作为话语事件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张凤阳 李 智(237)
一、引言	(237)
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撰述的两条线索	(239)
三、一个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和理论表达	(243)
四、体制内“守门者”的政治修辞术	(247)
五、公共论坛中的“一边倒”现象	(252)
六、结语	(256)

书 评

莱因哈特·科塞雷克：《概念史》与理解史	石坤森(261)
征稿启事	(269)

序：重审中国“近代”

孙 江

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历史》一书开篇劈头写道：“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①如果以今人的眼光看，文中的“历史”当指“功业”($\gammaενόμενα$)，而非“研究成果”($\iotaστορία$ / historia)，然而结果恰恰相反。循此，我们不难理解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为什么会扬文学而抑史学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写道：“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②历史与文学(诗学)的区隔不在于文体，而在于前者解释已发，后者书写未发；前者追求特殊性，后者带有普遍性。其时，相对于诗学，“历史”一词尚未普及，希罗多德《历史》中仅出现过 20 次，柏拉图只提到 4 次，亚里士多德最多，也不过 24 次。^③“历史”由“调查研究”而转为“功业”是后来的事情。

18 世纪前，“历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指向过去，恰如汉语里昨天的昨天是前天一样，“前”指向过去，当下的意义是由过去赋予的，过去(antiquus)是否定现在(modernus)的依据。18 世纪后，“历史”发生了根本转向——“进步”成为其孪生兄弟，从此“历史”不仅涵盖过去，还朝向未来，正如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所言，

① 希罗多德：《历史》上，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1 页。

② 亚里斯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28—29 页。

③ 柳沼重刚：《语言学者的散步道》，东京岩波书店 2008 年版，第 95—96 页。

“历史”是过去的经验空间和未来的期待视野相结合的产物。^①

距此一个世纪后，即19世纪中叶，中国人真正经验了这种“近代历史”。1870年，出使欧洲归来的清朝外交官志刚，在船驶入近海时，遥望中国大陆，在日记中写道：“尔谓中国为在中央乎？则大地悬于太空，何处非中？谓在中间乎？则万国相依，皆有中间。谓在中心乎？则国在地面。中国者，非形势居处之谓也。我中国自伏羲画卦已（以）来，尧舜禹文武周公孔孟所传，以至于今四千年，皆中道也。（中略）则所谓中国者，固由历圣相传中道之国也。而后凡有国者，不得争此中矣。”^②在此，中国不再是“中央之国”，而是伏羲画卦以来的“中道之国”。空间意义从“中国”脱落，“中国”被转化为一以贯之的时间概念。然而，这个时间已非过去的经验所能独占的。1873年，李鸿章在一则奏章中写道：“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③欧风挟着美雨，如不速之客，不请自来，过去的经验无法解释当下，中国处在“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之中。

19世纪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型期，它承袭了既往的余韵，开启了其后的型式。回看欧洲，在群星璀璨的“年鉴学派”那里，历史学家们之所以盘桓于中世纪晚期而耕耘不辍，盖源于对“近代”的怀疑，何以作为单数的近代得以从中世纪生发，其他可能性因此而隐没无闻？同样，中国近代的已然和盖然也隐藏在19世纪前后的历史——事件之中，这些值得深描细究。

事实与事件大相径庭，前者是“人类的功业”，如刮风下雨，不针对具体的人，后者有指向性。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认为事件不能完全客观化，因为对于观察者来说，事件本质上是纳入理解者的理解行为之中的，事件是对于某(些)人的事件，其意义伴随观察者所在的意义世界而变动。^④后现代文学批评家保罗·德曼(Paul de Man)甚至激进地认为：“历史不是进步或倒退，而是一种事件(event)，一种出现(occurrence)，当‘权力’‘斗争’等词突然浮现时，就存在历史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发生(happen)的瞬间，就存在所谓出现、所谓事件。因此，历史不是时间序列的概念，仅

① Reinhart Koselleck,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iming History, Spacing Concept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00–114.

② 志刚：“初使泰西记”，载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合订本，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79页。

③ 李鸿章：《奏为密陈遵旨通盘筹画制造轮船未可裁撤事》（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第一历史档案馆《录副奏折》，03-9402-019。

④ Michel de Certeau, *L'Écriture de l'Histoire*, Paris: Gallimard, 1975.

仅是从认知语言中突然出现的‘权力’话语。”^①

谈事件，不能不说社会史。社会史如一根橡皮筋，其弹性足以使之涵盖几个不同的领域。^② 社会史是从批判 19 世纪实证主义史学中产生出来的。实证主义史学执着于官方史料，认为可以用客观方法即经验方法直接观察事实，这回应了正在成长中的近代国家对历史的需求。20 世纪 20 年代后，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心理学、地理学、人类学等进入史家的“调查研究”中，“年鉴学派”与时俱进，从《社会经济史年鉴》(1929)到《年鉴——经济、社会、文明》(1946)，再到《年鉴——历史、社会科学》(1994)，刊名的变更反映了问题意识的变化，“二战”的悲剧让人们重新思考何谓近代文明，“语言学的转向”让历史成为社会科学的田野。

语言不仅是传达意义的工具，还有作为语言的功能意义，人的思考是由语言所决定的。^③ 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如是说。就历史/事件而言，调查研究的成果是表象行为的产物，是被再构的事实，论者只能借此寻找事实。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discourse)业已被滥用了，所谓话语就是借助语言表现内涵事件的张力。^④ 福柯自称历史学家，却给作为“功业”的历史宣判了死刑。1989 年，夏蒂埃(Roger Chartier)在《作为表象的世界》长文中，严厉地批判了过往“年鉴学派”的社会史实践，提倡打破结构的历史叙述，“在形成社会的各种结合和对立关系中，寻找切人口”。^⑤ 与“年鉴学派”主要人物有交集的日本法国史学者二宫宏之则说：“社会史概念是作为反对僵化的武器来使用的，不是自我限定的概念，而是逸出(はみ出し)的概念。”^⑥ 社会史本来就具有自我内省的批判精神，对历史的观察不仅要摆脱“东方学”(orientalism)的掣肘，还应该从普遍性转向地方性，从抽象的概念世界转向日常生活的世界。

历史认识论的转向对理解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至关重要。西美尔(Georg Simmel)有道：“秘密，赋予与公开世界相伴列的第二世界(einer zweiten Welt)以可能性，同时公开世界亦受到第二世界所具有的可能性的深深的影响。”^⑦ 粗言之，倘若中国存在两个“社会”的话，一个社会如宗族、行会及其派生物，是所谓的第一世界；一个

^① Paul de Man, *Aesthetic Ideology*,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 133.

^② Reinhart Koselleck,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iming History, Spacing Concepts*, p. 115.

^③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④ 参阅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 2003 年版。

^⑤ Roger Chartier, “Le monde comme représentation”, in *Annales ESC*, 1989, no. 6, p. 1507.

^⑥ 二宫宏之：《历史·文化·表象》，东京岩波书店 1999 年版，第 217 页。

^⑦ Georg Simmel, *Soziologie*, Georg Simmel · Gesamtausgabe, Herausgegeben von Otthein Rammstedt, Band 11,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2, S. 406.

社会如江湖、会党等，乃是第二世界。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第二世界被等同于“秘密社会”(secret societies)，污名化的语言表现——话语不仅反复进行能指的游戏再生产，还妨碍了对第一世界和由媒体、资本形成的新世界的把捉。

社会的近代转型未必触动人心。在《文明的进程》(1939)这部拓荒之作中，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强调要理解社会向近代的变迁，不变的“心性”是一个切入口。^① 埃利亚斯曾转述费弗尔(Lucien Febvre)讲过的一则故事。话说有一天早晨，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在位时间 1515—1547 年)从情妇家中出来，坐上马车准备回宫，途中听到远处教堂的钟声，内心为之一动，急令马夫调转方向，驱车前往教堂祈祷。弗朗索瓦一世昨夜的行为和今早的举止之间的分裂关乎“灵与肉”，如果在传统史家那里，一定会从道德统一性角度解释称国王听到钟声而心生悔意。但从心性史角度看，灵与肉是可以分离的，换言之，灵与肉共在，弗朗索瓦一世今晚仍可能还不回宫。1955 年，历史学家吕思勉在给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生讲话时讲起一段家史，他说自己的祖先吕公是明朝的“失节者”，做了清朝的“伪官”。^② 现代人吕思勉内心深处端坐着传统儒者的名节观，这一不变的心态与其历史写作两不相碍。

目下，记忆研究方兴未艾。心性史与记忆研究的根本不同在于，心性史研究过去积淀于现在的痕迹，而记忆研究则侧重于现代如何想象过去。后者涉及为何要研究历史，按照尼采的说法，一是好古，一是纪念，而最好的是与“生”——Leben 紧密结合的历史。^③ 但是，如此一来，与纪念的历史一样，历史叙述必然带有非历史的当下性。是的，对于文字这种历史/记忆的媒介，历来存在截然对立的理解：一种是怀疑的态度，认为文字在人心中播下“遗忘”，^④ “能愈多而德愈薄矣”。^⑤ 另一种认为文字具有魔力，是作为抵抗第二种社会之死——忘却的武器。从文字发明到印刷术的普及，再到今日电子媒介的无所不在，我们身处“链接性转向”(connective turn)时代。^⑥ 历史成为“潜在性”知识。人们不必在尘土堆中呼吸发霉的空气，寻寻觅觅，只需凭借一定的工具即可乾坤大挪移。“链接性转向”让冷漠的历史学终于感受到“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寒冬：固有的学科常识正在摇曳。

①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年版。

② 吕思勉：《史学四种》，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1 页。

③ 弗里德里希·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周辉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6 页。弗里德里希·尼采：“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载《不合时宜的沉思》，李秋龄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31—240 页。

④ 柏拉图：“斐德罗篇”275A，载《柏拉图全集》第 2 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⑤ 刘安：“淮南子·本经训”，何宁撰，《淮南子集释》中，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572 页。

⑥ Andrew Hoskins, “Media, Memory, Metaphor: Remembering and the Connective Turn”, *Parallax*, vol. 17. no. 4, Routledge, 2011, pp. 19–31.

回思 16 世纪末以降三百余年间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大致可以看出如下知识变动的轨迹：耶稣会士将中国知识传入欧洲后，影响了 18 世纪启蒙思想家思考世界的方式及其对中国的认识，此乃“宋学西迁”的结果。19 世纪来华西人传播的西学知识形塑了中国人的自我/他者认识，开启了建设现代国家的历程，是为“西学东渐”的产物。1895 年“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人大举东渡，移植日本西学知识（包括传入日本的来华西人传播的西学知识），更加速了这一进程，这是“东学入中”的知识往返。

学者日用而未必尽知。《亚洲概念史研究》系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主办的学术集刊，本书致力于从概念史的角度研究近代知识空间的形成，进而探讨别异于欧美的中国乃至东亚的现代性问题。1922 年，在西潮滚滚、骎骎乎有席卷全国之势下，一群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会聚南京大学的前身——国立东南大学，创办了《学衡》杂志。《学衡》旨趣曰：“诵述中西先哲之精神，以翼学；解析宇宙名著之共性，以邮思；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平心而言，不事嫚骂，以培俗。”逝者不可追，犹待来者。

文本比较